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o.C2022002

2022-3-25

## 新结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手册》之“新结构经济学”条目

林毅夫 付才辉<sup>①</sup>

本工作论文系列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新的尚未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学术讨论与评论，并不代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官方意见。

---

<sup>①</sup>林毅夫、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感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研究”（项目号 2021MZD015）对本研究的支持。

# 新结构经济学<sup>1</sup>

林毅夫 付才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 一、“中国奇迹”与新结构经济学

### （一）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为工具，以中国发展、转型经验和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总结一个经济体各种结构和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有关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自主理论创新，发展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体系（付才辉，2015a；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林毅夫，2020）。新结构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观察世界、分析真实现象的视角上。“一个中心”是以反映了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以变动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新结构经济学观察现象的切入点和内生化的一个经济体中各种层层相扣、相互关联的生产结构（**production structure**，由各种产业及各种产业使用的技术组成）、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中各种制度安排等等结

---

<sup>1</sup> 感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点研究”（项目号 2021MZD015）对本研究的支持。

构的分析原点（林毅夫，2017，2021a；付才辉，2020a）<sup>2</sup>，“三个基本点”则是一个经济在每个时点的各种结构是内生的、扭曲是内生的以及经济运行的方式也是内生的，这三个内生性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林毅夫，2020）。新结构经济学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为工具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与科学证伪上，即“一分析，三归纳”：“一分析”是以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选择作为分析现象、提出理论解释的方法，通过研究经济体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均衡来提出内部因果逻辑自洽，能解释相应经济现象的理论假说；“三归纳”是以“历史纵向现象比较、当代横向现象比较、多现象综合比较”来总结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或遭遇到的问题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和关键机制，并且以“历史纵向数据、当代横向数据、多现象综合数据”来检验经由一分析所提出的理论假说的真伪，即经验自洽（林毅夫，1995，2012）。

## （二）由中国奇迹孕育的新结构经济学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可知，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现代经济学中国化与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全新探索（林毅夫，2021b）。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林毅夫的开创和倡导之下（付才辉，2015a；赵秋运和王勇，2018；林毅夫，2018），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付才辉，2020b）：解读中国经济奇迹阶段（1988—2007年），第三代发展经济学阶段（2008—2018年），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阶段

---

<sup>2</sup> 为了行文的简洁，在文中的论述，有时将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称为“硬的基础设施”，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安排称为“软的基础设施”，以软硬基础设施来统称“infrastructure 和 superstructure”。

(2019 年以后)。“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这一名称虽然直到 2009 年才由林毅夫在其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研讨会上正式提出(Lin,2011),并倡导以此作为继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和 8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Lin,2009a,2012a),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林毅夫关于中国计划经济内生形成的原因及其改革的研究就已经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雏形(林毅夫,1989),并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做了完整的阐述(林毅夫等,1994),自 1994 年以来以该书的框架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已经开设至今。《中国的奇迹》以及《中国经济专题》(和后来的《解读中国经济》)所阐述的计划经济的内生形成逻辑及其改革思路,由于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认为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思想局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计划与市场关系论述提供了一种自洽的理论解释,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被作为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程实际上的教材(周端明,2021)以及国际上了解中国经济的权威教材(Lin,2012a)。

2008 年随着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脱胎于中国经济的新结构经济学迈上了国际多边机构的理论与政策舞台。新结构经济学打破了世行关于产业政策的禁区(Stiglitz and Lin, 2013; Stiglitz et al., 2013),旋即引起热烈的讨论。*The 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 (2011)、*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14)、《经济学(季刊)》(2013)、《经济评论》(2018)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相继出版专辑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政策应用。在理论上，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各种论著，特别是硕博论文在不同领域开始涌现。在实践上，新结构经济学也运用到诸多领域（付才辉，2018a），获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中产生了立竿见影和星火燎原的效果，在波兰于2015年10月上台的法律和公正党也正式宣布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波兰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Lin and Nowak, 2017, 2018）。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的政策影响力迅速提升，基本主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写入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先开设新结构经济学专业课和通识课，一些高校随即也开设新结构经济学系列课程，并涌现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等子领域课程。至今，国内外数十所大学相继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机构，一些高校创办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从本科生开始培养我国自主理论创新的人才。2019年首部新结构经济学学科通论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出版，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의正式诞生。

## 二、新结构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化

### （一）为何要倡导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化

新结构经济学是为现代经济学中国化所做的一个努力（林毅夫，2021c）。林毅夫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发表的祝贺文章《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提出：我国经济学人只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21世纪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

中心, 21 世纪将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林毅夫, 1995)。现代经济学自从 18 世纪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后, 到现在为止研究中心一直在欧美国家, 在将近 250 年中经过无数经济学大师的努力, 已经枝繁叶茂, 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有成熟的理论, 特别是关于经济运行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其中最成熟的核心, 历经 19 世纪边际革命之后在 20 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了公理化的严密体系 (Debreu, 1959), 并在 20 世纪后半叶历经信息革命(Stiglitz, 2002) 和行为革命 (Kahneman, 2003) 而不断完善。然而, 任何理论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 必然由理论提出者经过抽象和舍象两个过程来构建, 也就是, 理论提出者在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解决所遭遇到的问题时, 从其所处国家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找出决定性的变量保留在理论中作为所要解释的现象或解决的问题的因变量, 而舍象其他非关键性变量, 将其存而不论, 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 (林毅夫, 2012)。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若发生了关键性变化, 原来的理论就失掉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而会被一个新的理论所取代。

任何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和暗含前提是否不变, 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达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因此, 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 在中国是否可以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 发生在中国的许多现象或问题虽然似乎都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或解决,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 由于发展程度不同, 许多发达国

家的理论所舍象并作为暗含前提的社会经济变量很可能有关键性的差异。另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系中存在许多属于扭曲的社会经济变量，但是，这些扭曲所以出现不是随机的，都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内生差异，运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时难免经常会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用现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也难免时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所以，运用来自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的做法，固然写出来的论文看似很严谨并符合现有理论的预期而容易被已经接受了主流理论的国内外学界所接受和发表，但是，很可能没有抓住中国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失去了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现象或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可以使得经济学理论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统一的机会（林毅夫，2021c）。

## （二）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化

要推进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根据中国的经验现象或面临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一场结构革命(付才辉，2017a)。中国经济发展被称为是奇迹，也就是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存在的问题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然而成功和问题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些道理揭示出来就是推动经济学科发展的理论创新。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现象的总结，实际上研究的是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现代经济学理论提出者为了简化，必然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各种制度安排的

结构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其理论。由于缺乏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内生差异性的认识，理论提出者和学习及运用者会以为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不知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在发达国家构建理论时可以舍象的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变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关键性的差异和影响，使得理论成立的前提发生了变化，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直接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林毅夫，2012，2020，2021a、b、c）。

新结构经济学则从观察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了解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内生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由此探讨了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的“发展”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的“转型”问题，以及，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由于产业、技术、收入水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模、风险、交易特性下关系到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问题。这些探讨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于现有主流理论的观点和认识，由于都从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出发，而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因此，来源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实质上是一场对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上的结构革命。不同于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是以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的缺乏理论创新的惯常做法，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中国



化，这种创新性的理论体系能够在中国更好地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功能的统一，也能够比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同样的目标，提升了中国的话语权也分享了中国的智慧（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Åberg and Becker, 2020）。

### 三、新结构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

#### （一）作为新结构经济学起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本质

“关于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最需要创造性、最具挑战性的是，寻找或者猜测理论体系的起点，即通常称为公理或原理的那些内容。找到了起点之后，他说，任何受过良好数学训练的人，都能完成后面的步骤。他称寻找或选择公理的工作，为猜测上帝意图的工作，意指寻找理论体系的起点，而不是数学（即便涉及最前沿的数学，例如牛顿为建立体系发明了微积分；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应用了当时最前沿的非欧几何工具），是最需要创造性的部分，是难度最大的部分（许成钢，2020）。”在1994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林毅夫等以新中国成立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禀赋结构需求特征之间的矛盾作为逻辑起点，对宏观价格扭曲、中观计划配置、微观企业治理的“三位一体”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内生形成的机制及其转型路径的系统分析中，事实上已经寻找到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始概念与公理起点——要素禀赋结构及其供求原理，这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起源（付才辉，2021）。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初始概念，不仅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唯物辩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与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选择”结合起来融合了“历史性思维”和“自然性思维”，而且还与“商品二重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初始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付才辉，2021）。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质的物质第一性原理来看，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那么禀赋指的就是一个经济体所具备的从事经济活动所需，在做决策时给定而且有影响的条件，包括直接作为活动投入的要素禀赋，如土地、劳动、资本，也包含对活动有影响的非要素禀赋，如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林毅夫等，2018）。尽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以及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术语表没有含有“禀赋”或“要素禀赋”的词条，但中英文词典中对“禀赋”的各种释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即主体所具有的条件，对于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人类活动来讲，这些条件当然是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条件，即经济学中所指的禀赋。当然，经济学教科书中也随处可见“禀赋”或“要素禀赋”这一术语，如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的前提条件“禀赋、技术与偏好”中就包含“禀赋”，而且形式上也一样，但内涵实则大为不同。虽然新结构经济学也要研究嵌入经济结构之中的资源配置，也即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要素禀赋的内涵必然要包含决定配置和结构的双重内涵，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是给定结构下的资源配置则不能包含决定结构的禀赋内涵。借鉴马克思的创举，我们也可以用“禀赋二重性”突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禀赋内涵：既对经济主体（决策者）的配置也对结构选择产生约束（付才辉，2021）。其实，

经济学只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儿禀赋才只剩下配置这一层内涵了，在古典经济学家比如斯密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要素禀赋这一概念并且兼具配置与结构的双重内涵，尤其是结构的内涵（如要素禀赋以及基础设施决定作为一种结构安排的分工）对国民财富和性质的决定性作用。遗憾的是，正如一些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指出的，斯密模棱两可的解释败给了李嘉图更加形式化的模型(Landreth and Colander, 2002)。

李嘉图重新调整了经济学的关注点，将其从经济增长转向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持续到 20 世纪下半叶尴尬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解释不了经济增长为止。不过，这也给职业经济学家们带来了便利，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将所有的配置分析对象都高度统一地定义为没有复杂拓扑结构的“商品”（如依时间、空间、部门、状态等而定的各类商品）（Yang, 2001），如主流经济学家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卢卡斯等的《经济动态的递归方法》所做的那样。然而，套用一個时下热门的说法，这仅仅是既定结构下的“内卷”——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无论如何配置资源也改变不了作为前提条件的结构，结构才是决定配置也就是经济运行的幕后力量（阿瑟，2018）。然而，配置所嵌入的经济体系的各种结构不但性质不同而且层层叠加，由于各类结构安排的拓扑性质不同而难以完全统一起来分析，既需要分门别类地单独研究各类结构又需要理清清楚各类结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大大增加结构分析的难度。例如，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和教育体系以及环境体系，新古典经济学都可以高度地将金融资源、教育资源与环境资源从“商品”的概念上统一

起来进行统一的配置分析，然而金融资源、教育资源与环境资源所嵌入的金融体系结构、教育体系结构与环境体系结构却各有各的结构性质以及之间的联系也千差万别，并且在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之间更是充满多样性。新结构经济学建立起了一个可以把这些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结构差异和一个经济体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变迁都能内生，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给予自洽的解释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所需要的在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即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林毅夫，2020）。

在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一个经济体在任一个时点上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唯一能够把各种环环相扣的内生现象像抽丝剥笋一样一层深入一层地解析，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下去都迎刃而解的自变量（林毅夫，2020），这便是爱因斯坦所言的“猜测上帝的意图”。要素禀赋结构的性质蕴涵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两条初始命题：要素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和要素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要素禀赋结构的供求原理便是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中心”的内容，揭示了如下的最基本也最朴实的经济规律：任何经济体在给定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而变化，任何经济主体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活动都需要相应的各种要素的投入，因此经济主体的行为必然要面临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新结构经济学的其他原理或命题都是由此一环扣一环地演绎出来的，这便成为是理解经济体结构问题的“牛鼻子”。因此，“一个中心”的思想创造性地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经济系统的方法或视角。这种方法或视角一方面从物质第一性原则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揭示了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以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为工具从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选择与均衡出发揭示了经济系统的一般规律，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化、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

## （二）作为发展对象的经济结构内生的本质

以由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其供求原理构成的“一个中心”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体系起点，首先可以导出一组新结构发展经济学所刻画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要素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结构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要素禀赋结构的供求原理可以直接在理性选择与一般均衡中推导出要素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原理。如前所指出的，要素禀赋结构供求原理实质上指出了在一个经济体中经济主体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活动都要受到给定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总预算，以及由其结构所形成的相对价格的约束，由此内生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和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这种约束不论有无市场都是客观存在的（Lin, 1991）。正如张五常《经济解释》第四卷《制度的选择》开篇所指出的“从新古典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又称选择理论，即是人的行为或行为促成的现象一律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结果，包括自取灭亡的行为，而这选择是受到局限条件的约束。局限的转变可以翻成成本

或代价的转化。代价也是价，所以不管有没有市场，需求定律同样用得着。”新结构经济学被称之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盛行于战后的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的经济主体选择与发达国家同样现代化的、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与产业，以期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但却忽视了自身要素禀赋结构资本相对短缺的约束 (Lin, 2009a, 2012b)。

经济主体对技术与产业的最优选择或有效率的均衡则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取舍，即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原理或者最优生产结构原理——这与新古典贸易理论所讲的比较优势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因此，从要素禀赋结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初始概念及其四组基本原理出发，不但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经济结构多样性的根源，即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对应的最优生产结构也必然不同——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于生产方式中，因此当然也就解释了生产关系的多样性（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8章），而且还为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就导出了如何提升作为发展最根本驱动力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4章），即只有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最优的技术与产业，才能创造最大的经济剩余与获得最大的边际回报，可供积累的剩余、积累的倾向以及对外部要素流入的吸引力才最大，从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才会最快，反过来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才会最快，这便是“小步快跑”的智慧（林毅夫和张鹏

飞，2006；付才辉，2018b；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5章；付才辉等，2021）。因此，发展问题主要是研究一个经济体如何从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升级到生产力水平高的产业、技术、硬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升级带来的对收入、分配、软硬基础设施的影响，而由于各种结构环环相扣又是内生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驱动的，那么关键就是要研究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林毅夫，2020）。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的结构变迁框架中，有大量的理论与政策议题可资研究。首先，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帮助企业家将根据要素禀赋结构而言具有潜在比较优势（lat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实在的比较优势(actual comparative advantage)或是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产业 (Brautigam et al., 2018)<sup>3</sup>，特别是产业政策的研究（林毅夫等，2018），以及其他非要素禀赋如何发挥作用（许岩和尹希果，2017；欧阳志刚和陈普，2020）。其次，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推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以后，如何进一步从供给和需求双方推动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在现有基础上的内生变动；再次，上述各种结构变动对分工、收入、分配、家庭、社会、政治、规范、价值、理念等等一系列的影响。最后，在这些结构的变迁中，市场、政府、企业家、社会组织等的作用，特别是政府与市场

---

<sup>3</sup> 贸易上各种比较优势的理论只讨论要素的生产成本，但是，在现实中能存在的产业不仅要素生产成本要低，而且，包括由软硬基础设施所决定的交易成本在内的总成本也要低，因此，一般贸易理论所讨论的比较优势只是“潜在比较优势”，要变成“实在的比较优势”还需要克服软硬基础的瓶颈限制来降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是管理学的一个概念，一个产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前提是该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同时，还要形成产业集群以降低交易费用。更详细的概念辨识可参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条目。

的结构关系异常复杂（付才辉，2016a）。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之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全世界的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多数产业技术处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之内，对于和世界前沿有差距的产业和技术，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可以有后来者优势，这种后来者优势也存在于各种制度安排的创新上。在利用后来者优势时，对于选定升级的产业、技术、制度安排也必须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否则，可能就变成了赶超，而不能提高效率、公平、和谐以及消除贫困等，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错失后来者优势(Lin, 2003, 2016; 林毅夫和刘培林, 2003; Lin and Liu, 2006; Siddique, 2016; 付才辉, 2017b; 刘培林和刘孟德, 2020)。

### （三）作为改革对象的结构扭曲内生的本质

以由要素禀赋结构及其供求原理构成的“一个中心”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体系起点导出的新结构发展经济学所刻画的经济规律的基本原理是第一个基本点，第二个基本点是导出的一组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所刻画的经济转型规律的基本原理：自生能力原理与最优改革原理。第一个基本点实际上是第二个基本点的参照系，由于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结构是内生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各种结构是否存在扭曲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如果经济主体的结构存在扭曲那么就会没有自生能力。由于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是层层叠加的，扭曲可以发生在任何层次上，底层的结构扭曲会导致下一层次的结构扭曲，下一层次的结构扭曲也会反过来对上一层次的



结构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如果偏离了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符合比较优势的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技术结构，就会产生底层的结构扭曲，从而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其他结构安排的扭曲（林毅夫等，1994；Lin，2009a；林毅夫和龚强，2010；李飞跃和林毅夫，2011；张鹏飞，2011）。所以，转型或改革的问题主要是研究一个结构存在扭曲的经济体如何消除扭曲变成一个各种结构环环相扣并且没有扭曲的经济体。需要注意的是，扭曲与否是跟自己的“最优”结构比较而来的，而非像现在主流经济学研究文献上的流行做法那样，把凡是和发达国家有差异的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并且，转型的目标不是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而是适应于自己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7章）。

由于结构扭曲可以发生在经济体的不同方面，而自生能力原理都是适用的，只是涉及的主体不同而已，比如一些研究将其应用于教育领域提出了高校自生能力（刘向兵等，2014）与学术自生能力（郭裕湘，2018）以及应用于基层治理提出社会自生能力（杨文欢，2019）等概念。然而，发生在产业与技术层面的扭曲更加底层，便涉及到企业自生能力这一关键概念（Lin et al., 1998; Lin and Tan, 1999）。如果产业与技术存在扭曲，那么进入该产业与采纳该技术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即便有正常的管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也不能获得市场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不会有企业家愿意去投资，如果因为错误判断而投资，也不可能竞争性市场中长期生存下来或者长期存在（吴清扬和姜磊，2021），除非政府给予保护

补贴才会有企业家去投资，或继续让其存在，这便产生了政策性负担而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Lin and Tan, 1999；龚强和徐朝阳，2008）。例如，在重工业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与科尔奈不同（Kornai, et al., 2003），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Lin and Li, 2008）；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政府剥夺企业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Liao et al., 2009; Jian et al., 2021）。企业自生能力与政策性负担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因素（林毅夫等，1997；林毅夫和刘培林，2001；李周等，2020；Lin, 2021），也是僵尸企业等问题的根本因素（申广军，2016）。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总量的概念，而企业自生能力则是一个微观概念，涉及新结构生产者理论或新结构企业理论（林毅夫与付才辉，2019，第3章；付才辉，2021）。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可以囊括新增长理论所研究的规模报酬递增技术和垄断竞争的情形，而且也更一般地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作为新结构一般均衡的退化特例。经济体中单个决策者作为价格接受者在进行产业与技术选择时并不直接受到经济体总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最优的产业与技术（同时还包括配置）选择是要素禀赋相对价格（同时还包括产品价格）的对应，但是要素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是在要素禀赋结构供求均衡的一

般均衡时确定的，因此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间接影响其中的单个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所以，不论是优化决策还是一般均衡时，企业自生能力原理都是成立的。因此，经济主体对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相对价格所内生决定的最优结构及其均衡的偏离都将导致一个额外的损失，这种状态要在经济体中存在必须内生出其他扭曲状态来填补这个没有企业自生能力导致的损失，也就是用一种扭曲的办法来解决一种扭曲。由于结构又是层层叠加、环环相扣，改革一层的结构扭曲固然可以消除这一层的效率损失（即改革的收益），但也同时破坏了保护内生这一层结构扭曲的上一层扭曲结构的稳定（即改革的成本），最优的改革方式需要权衡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即考虑扭曲的内生性。这便是最优改革原理所要揭示的消除结构扭曲的基本规律（徐朝阳和林毅夫，2011；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7章）。

与阿西莫格鲁等（2015）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成决定性作用从而认为包容性制度是繁荣而攫取性制度则是贫穷的根源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关于发展与转型的原理解释了一个经济体的成功与失败的基本规律。<sup>4</sup>不过，与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旨在解释一个经济体如何成功相反，转型的自生能力原理则解释了一个经济体如何失败，前者揭示了结构升级的向上循环累积，后者揭示了结构扭曲的向下循环累积（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Lin et al., 2021）。这在文一（王丽莉和文一，2017；文一，2018a）所称之为描述一个经济体结构变迁轨迹的“付-林图”中一目了然（林毅夫和付才辉，2016，2020），也被

---

<sup>4</sup> 更详细的历史和政策实践内容可参考“后发国家的追赶理论与政策”条目。

大量跨国实证研究所支持（Bruno et al., 2015;陈斌开和伏霖，2018）。既然扭曲是内生的，那么，消除扭曲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不能像把扭曲当作是外生的主流经济学文献那样，认为去掉扭曲就可以，而是必须针对扭曲产生的原因，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消除那些根源，然后才能水到渠成去掉扭曲使结构恢复到最优。盛行于战后的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由于忽视了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倡导的重工业赶超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了系统性的扭曲，而以失败告终；盛行于旧结构主义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由于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系统性结构扭曲的内生性，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约束，主张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同样以失败而告终（林毅夫,2002b; Lin,2015a）。

#### （四）嵌入内生经济结构之中的经济运行的本质

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一个中心”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体系起点导出的关于经济发展中结构的内生化和经济转型中扭曲的内生化的基本原理是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第一和第二个基本点，第三个基本点则是揭示嵌入内生的经济结构和扭曲之中的经济运行也是内生的。经济运行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新结构经济学也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这一主题（Ju et al., 2015），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源配置置于一个外生给定的“容器”（结构）中来研究“容器”内的配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则连同“容器”一起当成是内生的来研究（付才辉，2021）。在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不同的内生结构间会有共性，但也会因为“容器”（结构）的不同而在经济运行上产生“殊性”。例如，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需要靠创新，但是，不同发展

程度的国家创新的方式可以不同，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创新只能靠自主发明，处于世界技术前沿之内的发展中国家，创新既可以靠自主发明，也可以靠引进，这种“殊性”因为是内生于内生的结构，对具有相同内生结构的国家而言则具有一般性。

理论上讲，包含配置均衡的结构均衡所产生的总效应也包含配置效应与结构效应，可以统一地解释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仅有配置效应而无结构效应所无法解释的结构变迁中的诸多经济运行现象——这些大量难以被新古典经济学所解释的现象往往都被流行理论或思潮粗暴地嗤之以“扭曲”或“病态”（付才辉，2021）。例如，文一（2018b）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从西方训练回国的经济学家，或好多国内自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家，都在不同场合抱怨说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了，一度占到国民经济总收入的 50%左右甚至更高，挤出了私人消费。他们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金融压抑造成国企过度投资，扭曲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而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最充分理由居然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比如 2015 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 3.7%，日本是 4.2%，OECD 国家平均不到 10%，而中国则为 47%。”事实上，英美在其工业化历史上也有处于不断上升的高位储蓄率阶段（Madsen, 2019）；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也是战后 13 个发展典范的特征事实之一，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但 20 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率比拉丁美洲高 20 个百分点；中国处于高速

工业化阶段的高储蓄率现象背后具有与世界一样的一般性的规律，这是因为在结构升级的后来者阶段有许多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来源的好的投资机会，并且，需要投资才能使这样的机会从潜在（latent）变成实在（actual），而不是盲目以结构已经处于世界前沿必须依靠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才能实现产业升级的主流标准理论或发达国家现有的经验作为参照系下“扭曲”的定论（林毅夫等，1994；Lin, 2012b, ch2；文一，2016，2018b；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5章；付才辉等，2021）。

总之，“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还有着更深刻的范式革新：把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甚至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付才辉，2016b, 2018c；林毅夫和邢海鹏（Lin and Xing），2020；付才辉，2021）。正如马斯-克莱尔等在其权威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理论》第四部分介绍“一般均衡”的开篇所交待的：“一般均衡有双重含义，它不仅指一种方法，也指一种独立的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法有两个核心特征。首先，它将经济看成一个封闭和相互关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必须同时确定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变量的均衡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均衡法与局部均衡法明显不同：在局部均衡法中，如果经济环境扰动对内生变量的影响与我们研究的问题不直接相关，那么我们可以忽略它。一般均衡法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是，它将外生变量个数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仅剩下少数几个描述客观现实的外生变量（例如，经济个体集合、可利用的技术、偏好以及各个个体的商品禀赋等）。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一般均衡理

论有着自己的特定含义：它是一种旨在确定完全竞争市场系统的均衡价格和产量的理论，这种理论雄心勃勃，它试图仅使用下列条件来预测最终消费和生产的全部向量：经济的基本面（一组商品、技术状态、偏好和禀赋）；制度假设——每种商品（包括均衡时不进行交易的物品）都有价格；行为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价格接受者”（2014，中译本，第4部分，第500页）。新结构经济学可以把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面都予以内生化的，同时兼容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从而形成完全封闭的自洽的动态系统。

#### 四、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与西方经济学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并不像现在流行思潮惯常采取的那样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都认为是应该也是可以消除的扭曲，而是去探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要素禀赋、产业、技术到各种制度安排层面的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的根本自变量出发，根据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推导出内生的生产（产业、技术）结构，并根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需要，内生出硬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的结构？以及从不同层面结构变迁自发协调的滞后性和政府过去好心干坏事所导致的许多内生扭曲等视角来看，与现在主流的观点比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凡是以这种范式来总结经验和研究问题的成果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范畴。事实上，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现

代经济学以后，等于是将现代经济学从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二维理论体系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理论体系，系统研究的结果会在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各个领域有许多新的重要的理论见解，产生诸如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组织学、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政治经济学、新结构货币经济学、新结构财政经济学等新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而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付才辉，2020b）。我们现在正处于这场革命爆发的前夕，期待学界同仁加入其中，摆脱西方主流理论的束缚，在做研究时都自觉地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以及存在扭曲时扭曲的内生性，以及嵌入内生结构和扭曲之中的经济运行的差异性和内生性放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中，这样大家都有可能成为各自的新结构经济学子领域的开创者（林毅夫，2020）。

### （一）金融体系的结构与新结构金融学

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主要是统一了各个领域的资源配置，比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中“商品”可以是依状态而定的金融产品，因此成为研究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的新古典金融学的基础。然而，任何经济体的金融资源配置都是发生在具有内生的不同结构安排以及可能存在结构扭曲的金融体系之中，并受到其他经济体系安排的影响。以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结构金融学已得到广泛探索（林毅夫等，2009；林毅夫和



付才辉，2019年，第13章），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在融资规模、风险和信息等方面存在结构差异，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结构随实体经济的结构差异而有系统性的不同（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Demirgu, et al., 2011；Gong, et al., 2019），相应的金融市场运行特点和金融创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林毅夫等，2019）；如果实体经济存在结构扭曲，也必然导致相应的金融结构扭曲（林毅夫和李志赞，2005；张一林和蒲明，2018；姜磊等，2020；张一林等，2021）；扭曲的金融结构不但会影响产业与技术的生产力，抑制经济发展（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Lin, et al., 2015；林志帆和龙晓旋，2015；杨子荣和张鹏杨，2018；毛盛志和张一林，2020），也会影响金融市场运行（刘慧龙等，2014），还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尹雷，2016），并给经济体系的其他方面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不利于收入分配（陈斌开和林毅夫，2012；姚耀军和李明珠，2013）和消费者福利（谢贤君等，2019）。具体到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占多数的经济主体是中小企业和农户，最适宜的金融结构主要是中小银行占主导的金融结构。因此，新结构金融学中“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假说目前在研究上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例如，刘畅、刘冲和马光荣（2017）利用全国县级层面2006—201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会增加0.0568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分别会增加0.1元、0.199元和0.248元。因此，通过

金融结构特别是银行业结构的调整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林毅夫的相关政策建议也入选全国政协成立 70 年来有影响力的 100 件提案。用新结构金融学研究金融体系的各个结构维度及其高质量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议题（徐忠，2018；林毅夫等，2019）。

## （二）教育体系的结构与新结构教育经济学

与金融体系一样，一个经济体的教育体系也同样有着不同的结构安排并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变化，如格林（2004）著名的比较教育体系研究所展示的那样。与新结构金融学是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来研究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变迁的决定、金融结构的扭曲以及嵌入金融结构及其扭曲状态中的金融资源配置的子领域一样，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来研究教育体系的结构及其变迁、教育结构的扭曲以及嵌入教育结构及其扭曲状态中的教育资源配置同样可以形成一门新结构教育经济学。因袭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范式，传统的教育经济学囿于教育资源的配置研究，特别是用教育生产函数研究学校的投入产出配置。然而，不同的教育体系结构下，教育资源配置会存在的明显的差异，而教育体系的结构又是内生于产业与技术结构所需的人力资本的教育结构需求，如果产业与技术存在扭曲，也将导致教育体系的结构扭曲，不但影响教育的效率，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因此类似于最适宜金融结构理论一样，也存在最适宜教育结构理论（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 14 章）。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曹淑江教授带领其团队率先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赶超战略导

致的教育结构扭曲问题（曹淑江，2016；曹淑江和李倩，2018；曹淑江和瑞雪，2019）。李翠妮等（2020）用中国的数据检验了最适宜教育结构假说。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可以运用新结构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去探索内容丰富的现象和问题（刘向兵和伍聪，2014；郭裕湘，2018），推动形成一门新结构教育经济学。

由于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因此与最适宜教育结构相对应的是最适宜人力资本结构理论（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14章）。与单纯强调人力资本重要（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的传统理论不同，人力资本结构要与产业和技术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相匹配，其重要性才能被释放出来，否则如果偏离了最适宜人力资本结构，那么不但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和教育回报率受到抑制，并导致人力资本外流，而且如果人力资本无用武之地还会影响社会稳定。最适宜人力资本结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难以解释的诸多现象：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很多时候都未带来所期待的经济增长而打了水漂(Pritchett, 2001)，比如加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不及泰国但其后几十年持续发展教育并一路领先于泰国，而加纳的人均收入水平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与泰国差不多但其后却徘徊不前反而被泰国甩开了距离；为什么不同层次的教育收益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地区会发生逆转，比如在产业层次比较低的发展阶段或地区出现的“脑体倒挂”，就像人们过去调侃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付才辉等，2013；杨蕙馨和王海兵，2015），也像人们现在调侃的“北上广深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放不下灵魂”（张天华等，

2017），即便是在美国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州也是如此（Vandenbussche et al., 2006）；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出现大量的“脑流失”（Docquier and Rapoport, 2012）；为什么偏离最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林志帆，2015；Feng and Li, 2019；陈加旭和何尧，2020），等等。

### （三）空间体系的结构与新结构空间经济学

最近一篇由国内学者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的关于知青下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文章(Chen *et al.*, 2020)引起了很多有此背景的经济学家们的反感，认为文章得到的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结果，尽管从局部和单一效果看知青下乡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和带来初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and 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 1700 万知青中断学习去下乡给个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田国强，2021）。然而，这可能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现象？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当时采取了违背那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无法创造足够的城市就业岗位，不但无法吸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逻辑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姜磊等，2021），而且还难以满足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需求，于是就出现了严苛的户籍制度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象（林毅夫等，1994）。这事实上也为中国过去曲折的城市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陈斌开和林毅夫，2010，2013；刘瑞明和石磊，2015）：中国 1949 年的城镇人口占比

仅 10.64%，随后在 1960 年增加到 19.75%，然后其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逐步下降，直到 1981 年城镇人口比重才重新回到 1960 年的水平，随后一路高歌到 2011 年城镇常住人口首次历史性地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也意味着刘易斯观察到的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现象并非给定的前提特征事实而是内生的结果(付才辉, 2014, 2016c)。

前述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影响的逻辑在适用于区域之间(林毅夫和付才辉, 2019, 第 15 章)。城市化与区域结构都是空间体系结构的构成内容, 城市化的新结构经济学也体现出新结构空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一个经济体的空间体系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扭曲以及空间中的资源配置都是内生于该经济体更底层的经济逻辑, 即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的特性。然而, 空间特性在新古典经济学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因为“商品”的定义已经包含了空间特性。然而, Starrett (1978) 提出的空间不可能定理证明一个具有有限个区位的经济, 如果空间是同质的, 在存在运输成本且偏好是局部非饱和时, 不存在包含区位间商品运输的竞争均衡, 即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要素流动与区际贸易不相容。空间如果要具有独立的意义, 需要放宽空间不可能定理背后假设的中一个假设, 如果把运输成本当作不可避免的, 就必须假设空间非同质性或生产非凸性。不过, 不论是采取放松生产凸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还是采取放松空间同质假设的新新经济地理学, 本质上还是给定生产结构下的资源在不同空间的配置(空间甚至可细分到经纬度(Allen and Arkolakis, 2014))。新结构空间经济学则可以把(不论是哪种假定下)空间资

源配置嵌入空间结构中，最适宜的空间结构则是地理单元的空间结构供给与生产结构的匹配，如果出现空间结构扭曲则会抑制空间的生产力也会破坏空间本身。中国正在推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如何将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融为一体是新结构空间经济学重要的实践课题，也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和政策的创新机会（邓祥征等，2021）。

#### （四）开放体系的结构与新结构国际经济学

很多人极易把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比较优势与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相混淆。在理性选择的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层面，比较优势的实质指的是机会成本的高低，可以适用于任何领域。新古典贸易理论讲的比较优势指的是两个经济体之间资源配置安排的机会成本高低，一个经济体在一种资源配置安排上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则意味着有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也研究资源配置，但是所研究的资源配置是嵌入到内生的结构变迁之中。因此，在一个经济体内部，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指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包括产业和技术的最优生产结构安排，比如最优的产业结构与每个产业的技术结构等；在两个经济体之间，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比较优势才指的是在每个经济体内部都形成了最优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同时并在经济体之间所形成的最优贸易结构。事实上，正如罗伯特.C.芬斯特拉在其教材《高级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中所总结的，H-O理论诞生后的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呕心沥血的实证检验得到的共识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假定不同要素禀赋国家之间技术相同的假设最不合

理，这也是恰恰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换言之，新古典贸易理论其实是新结构贸易理论的退化特例（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16章）。新结构贸易理论由于同时统一了结构的决定机制和配置的决定机制，也因此必然存在两种效应，即结构效应和配置效应，如果结构效应起到支配作用的时候，那么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和罗布津斯基定理在理论上也完全有可能不再成立（付才辉，2021）。

除了国际贸易结构外，国际金融结构也是新结构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比如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管理等等。国际资本流动一个重要的经验特征事实便是，就全球总量而言，发达经济体吸引了大部分 FDI。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缺乏结构与结构变迁，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而边际报酬递减。这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加稀缺，其边际报酬应该更高，因此资本理应从发达经济体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然而，这个理论预测与现实截然相反，因此被称之为“卢卡斯之谜”！但是，国际资本流动还有一个典型经验特征事实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吸引的 FDI 超过了欧洲和北美，诸如中国和“亚洲四小龙”都吸引了巨大的 FDI。这需要引入结构（Jin, 2012）和结构的内生以及结构扭曲的内生性来统一这两个特征事实解释（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16章；Lin and Wang, 2019）。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哪一种国际资本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引入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视角来看待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门

户大开”（Lin, 2015b; 智琨和傅虹桥, 2017）。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龚刚等, 2012)以及结构变迁中的汇率问题（Ju, et al., 2020）也是新结构国际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另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关系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关系，这也是新结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Rodrik, 2010; 林毅夫和王燕, 2016; 林毅夫和蒙加, 2017; 刘卫东等, 2017; 徐丽鹤等, 2020; 林毅夫和付才辉, 2020）。

### （五）环境体系的结构与新结构环境经济学

传统的环境经济学与传统的金融学一样，都是采取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范式来研究环境资源配置，当然正如金融资源有其特殊性一样，环境资源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很多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产的，污染是带负效用的商品。同样，任何经济体的环境资源配置都是发生在具有不同结构安排以及可能存在结构扭曲的环境体系之中的，并受到实体经济基本面的支配和其他经济体系安排的影响。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研究环境体系的结构及其变迁可以形成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林毅夫和付才辉, 2019年, 第18章; 林毅夫等, 2021a）。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最优生产结构和能源结构也将随之变迁(Wang, 2019); 随着最适宜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其中产业和技术的环境特性也将发生变化，从而最适宜的环境体系及其结构也将发生变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与之对应的最适宜生产结构不同，由于不同的产业技术有不同的能耗与污染排放特性，则对应的最适宜环境污染结构不同，从而就存在一条最适宜的



环境污染曲线，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观点有类似之处但理论机制却有所不同（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林毅夫等，2021b）。同样，如果实体经济存在结构扭曲，会导致环境问题的恶化。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导致能源效率低（王坤宇，2017）、造成环境治理不足（郑洁等，2019），其中违背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也将缺乏自生能力，在此情况下，企业自身都难以维持生存，更不可能将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加剧污染（郑洁和付才辉，2020；Zheng *et al.*, 2021）。

## （六）宏观体系结构与新结构宏观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宏观经济现象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也超出了基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政策总结的宏观经济学所能解释和解决的范畴（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 17 章）。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虽然不断加速，但是一直处于世界的产业技术前沿，靠自主发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其增长的潜力远低于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具有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国家（Lin, 2016；林毅夫等，2021），然而为何有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利用了、而有的却未能利用后来者优势的经验教训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林毅夫，2002a, 2003；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Lin, 2003, 2016；刘培林等，2015, 2020；刘培林和刘孟德，2020；Chen and Lin, 2021），以及不同发展战略下经济增长（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邓宏图等，2018），在更一般层面上还要研究结构变迁驱动的新结构增长理论（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 4 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现象也有别于发达国家，更容易因为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而遭受

经济不稳定之苦 (Aguiar and Gopinath, 2007; Jones and Olken, 2008), 特别是遭受结构扭曲的发展中国家也更容易遭受通货膨胀之害 (林毅夫和付才辉, 2019, 第 17 章)。新结构宏观经济学需要系统探索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波动特征及其成因以及适宜的宏观调控政策, 特别是结构变迁中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结构性财政政策与超越新古典主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新结构经济学机制 (Lin, 2009b; Lin and Doemerland, 2012; 战明华等, 2021), 以及针对“潮涌现象”的宏观经济管理 (林毅夫, 2007; 林毅夫等, 2010; 张成思等, 2013)。此外,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宏观冲击也提供了诸多观察窗口以及可资研究的现象和问题 (Lin, 2012c; 林毅夫等, 2020)。

### (七) 制度体系的结构与新结构制度经济学

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体当中的很多因素, 由于各个经济体诸多因素的不同, 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进制度 (Lin and Nugent, 1995; 林毅夫, 2003)。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时基本放弃了制度内生性, 而只侧重制度的重要性, 特别是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安排“先进”与否的参照系。与之不同, 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在承认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同时, 认为何种的制度安排合适取决于经济基础对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提供制度服务的成本 (Lin, 1989)。一个经济体如何根据经济基础, 也就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规模、风险和交易特性对制度服务产生的需求 (Nunn, 2007), 以合适的制度安排来提供制度服务使得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的适宜制度体系就是

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尽管如 Williamson（2000）所指出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理性深度、策略性质、经济后果、变迁动力、变迁频率、变迁难度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适用的，如对于“二阶经济”的合约安排，关于创新活动与非创新活动的最优合约安排就各不相同（Manso, 2011），又如即便是对于“非算计”的文化，不同地区的农业禀赋条件不同适宜种植的农作物以及耕作方式不同都会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倾向的塑造产生不同的影响（Talhelm, et al., 2014; Olsson and Paik, 2016; Ang, 2019），还比如介于二者之间“一阶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法律的合适安排也受到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鲁桐和党印, 2014; 刘辉, 2018, 2019）。

#### （八）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与新结构公共经济学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全面地概述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及其在各个领域研究中运用的情况。熟悉公理化方法（不一定是纯数学形式公理化）的读者，大概已经熟悉了以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构成的“一个中心”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体系的起点，所导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与经济运行的六大基本原理，分别揭示了一个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和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结构内生和扭曲内生，以及嵌入内生的结构和内生的扭曲中资源配置内生的基本规律。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底层逻辑和分析框架，“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同样也贯穿于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教育体系、空间体系、开放体系、环境体系与制度体系等各个方面，并结合各个体系

自身的结构特性形成了支撑相应子学科的基本原理，比如林毅夫等（2021a）所概括的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后，我们再讨论一类比较特别的结构安排——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到了经济体的各个方面，而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例如金融体系、教育体系、环境体系等等都有政府与市场身处其中而具有非常强的一般性，前面的讨论中或多或少都涉及这一议题，这里将其单独列出。同样，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一个中心”，以及根据给定的各种产业和技术的特性和给定的个人偏好所形成的禀赋供求结构原理，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公理化体系起点，可以导出一组揭示经济发展、转型与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规律的基本原理：因势利导原理和最适宜干预原理（付才辉，2016c）。这样便构建起了完整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十大原理”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心思想。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既是实证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界定？20世纪西方理论界，不论是从庇谷到科斯，还是从凯恩斯到卢卡斯，以及影响更甚的哈耶克和兰格之争，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之争的实质是关于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实现机制这一关于经济运行的核心议题（包括信息、外部性、理性预期、机制设计等），理论焦点在于政府与市场这两种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谁优谁劣（Acemoglu *et al.*, 2008）。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分析框架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置于更全面的背景中，除了在给定结构下经济运行即资源配置中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外，还需要在结构变迁中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付才辉，2016；

Lin and Wang, 2017)。因势利导原理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标准，即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Lin and Monga, 2011; Lin, 2014, 2017）。以此作为准绳可以划分政府的行为类型，如“有为政府”、“不作为政府”、“乱为政府”（付才辉，2017c; 王勇和华秀萍，2017; 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9章）。政府角色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取决于政府的行为能力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林毅夫等（2021）利用中国疫情期间的消费券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利益集团说、个人利益说、为人民服务说三种假说，就消费券的发放而言，其结果支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有为政府假说。当然，还可以从行为结果来看，现实中广泛存在政府行为在结构升级与结构失衡之间的权衡取舍现象（付才辉，2015b, 2016a; 林晨和陈斌开，2018; Itskhoki and Moll, 2019）。

## 五、结语与展望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以改造好世界，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好世界则要求理论以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条件作为暗含前提，这样的理论仅能来自于自己国家的经验总结，或是为解决自己国家当前的问题，了解它怎么产生，背后的因果逻辑是什么，把这些机制理解清楚，形成的理论。只有以这样自主创新产生的理论来指导政策实践才能使理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统一起来。新结构经济学将反映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新结构理论体系的原点，并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

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引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忽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内生差异性的主流经济学进行了一场结构革命，对现代经济学的每个子领域都能产生重要的、新的理论见解，使经济学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

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和学科建设，需要时不我待地抓紧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细致全面地研究经济体系各种结构是如何内生的、结构扭曲的前因后果、嵌入内生结构中的运行的差异性等问题。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曾言：“只要某一科学的分支能够提出很多问题，他就有存在的理由”。其次，要用公理化的方法搞清楚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底层逻辑，不断充实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否则就会像科斯对老制度经济学的评论那样（Coase, 1998）：“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

### 参考文献

1. 安德鲁·马斯-克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2014：《微观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安迪·格林，2004：《教育与国家的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教育科学出版社。
3. 布莱恩·阿瑟，2018：《复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4. 曹淑江，2016：《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教育发展优先次序》，《教育研究》第9期。
5. 曹淑江、李倩，2018：《三个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优先次序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第4期。
6. 曹淑江、袁瑞雪，2019：《解析“教育的倒金字塔”之谜》，《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第3期。

7. 陈斌开、伏霖, 2018: 《发展战略与经济停滞》, 《世界经济》第1期。
8. 陈斌开、林毅夫, 2010: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 《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9. 陈斌开、林毅夫, 2012: 《金融抑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世界经济》第1期。
10. 陈斌开、林毅夫, 2013: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11. 陈加旭、何尧, 2020: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经济问题探索》第7期。
12. 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 2015: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3. 邓宏图、徐宝亮、邹洋, 2018: 《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研究》第11期。
14. 邓祥征、梁立、吴锋、王振波、何书金, 2021: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地理学报》第2期。
15. 付才辉, 2014: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产业经济研究》第5期。
16. 付才辉, 2015a: 《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 《制度经济学研究》第4期。
17. 付才辉, 2015b: 《为增长而失衡——中国式发展的经验与理论》, 《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18. 付才辉, 2016a: 《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最优干预原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付才辉, 2016b: 《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项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20. 付才辉, 2016c: 《中国的城市化: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北京大学-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研究报告。
21. 付才辉, 2017a: 《新结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经济评论》第3期。
22. 付才辉, 2017b: 《市场、政府与两极分化——一个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不平等理论》, 《经济学(季刊)》第1期。
23. 付才辉, 2017c: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 《学习与探索》第5期。
24. 付才辉, 2018a: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进展:工具与案例》, 《制度经济学研究》第1期。
25. 付才辉, 2018b: 《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经济评论》第1期。
26. 付才辉, 2018c: 《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初探》,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27. 付才辉, 2020a: 《简析马克思主义与新结构经济学》, 《当代经济研究》第11期。
28. 付才辉, 2020b: 《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建设初探》, 《中国大学教学》第4期。
29. 付才辉, 2021: 《新结构经济学分析基础》,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手稿。
30. 付才辉、林民书、赖小琼, 2013: 《产业升级、民工进城与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经济评论》第4期。
31. 付才辉、郑洁、林毅夫, 2021: 《发展战略与高储蓄率之谜——一个新结构储蓄理论假说与经验分析》, 《经济评论》第1期。

32. 龚刚、高坚、李炳念, 2012: 《储备型汇率制度: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选择》, 《经济研究》第9期。
33. 龚强、徐朝阳, 2008: 《政策性负担与长期预算软约束》, 《经济研究》第2期。
34. 龚强、张一林、林毅夫, 2014: 《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 《经济研究》第4期。
35. 郭裕湘, 2018: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36. 姜磊、郭玉清、刘梦琰, 2020: 《比较优势与企业杠杆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
37. 姜磊、杨洁、郭玉清、张馨月, 2021: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就业——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38. 李翠妮、葛晶、付才辉, 2020: 《教育结构适宜性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1期。
39. 李飞跃、林毅夫, 2011: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扭曲》, 《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40. 李周、李劫、周轶韬, 2020: 《我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及培育》, 《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
41. 林晨、陈斌开, 2018: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2期。
42. 林毅夫, 1989: 《改革的前途在于确立新的发展战略》, 《瞭望》第18期。
43. 林毅夫, 1995: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 《经济研究》第10期。
44. 林毅夫, 2002a: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经济学(季刊)》第1期。
45. 林毅夫, 2002b: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研究》第12期。
46. 林毅夫, 2003: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学(季刊)》第3期。
47. 林毅夫, 2007: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 《经济研究》第1期。
48. 林毅夫, 2012: 《本体与常无》, 北京大学出版社。
49. 林毅夫, 2017: 《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 《经济研究》第5期。
50. 林毅夫, 2018: 《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经济学(季刊)》第2期。
51. 林毅夫, 2020: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52. 林毅夫, 2021a: 《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 《中国科学基金》第3期。
53. 林毅夫, 2021b: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大学与学科》第3期。
54. 林毅夫, 2021c: 《为实现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而办刊——祝贺《经济学》(季刊)创刊20周年》, 《经济学(季刊)》第5期。
55.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4: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
56.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7: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
57. 林毅夫、付才辉, 2016: 《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58. 林毅夫、付才辉, 2019: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试行本)(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59. 林毅夫、付才辉, 2020: 《解读世界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60. 林毅夫、付才辉、任晓猛, 2019: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金融论坛》第 11 期。
61. 林毅夫、付才辉、郑洁, 2021a: 《新结构环境经济学: 一个理论框架初探》,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62. 林毅夫、付才辉、郑洁, 2021b: 《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初探: 理论、实证与政策》, 北京大学出版社。
63. 林毅夫、龚强, 2010: 《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选择》, 《管理世界》第 3 期。
64. 林毅夫、李志赟, 2004: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经济研究》第 2 期。
65. 林毅夫、李志赟, 2005: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66. 林毅夫、刘培林, 2001: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经济研究》第 9 期。
67. 林毅夫、刘培林, 2003a: 《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 《经济学季刊》第 2 期。
68. 林毅夫、刘培林, 2003b: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第 3 期。
69. 林毅夫、刘培林, 2003c: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70. 林毅夫、塞勒斯汀·孟加, 2017: 《战胜命运》, 北京大学出版社。
71. 林毅夫、沈艳、孙昂, 2020: 《中国政府消费券政策的经济效应》, 《经济研究》第 7 期。
72. 林毅夫、沈艳、孙昂, 2021: 《政府决策动机研究——以中国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决策为例》,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NO.C2021003。
73. 林毅夫、孙希芳, 2005: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经济研究》第 7 期。
74. 林毅夫、孙希芳, 2008: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第 9 期。
75.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 2009: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 《经济研究》第 8 期。
76. 林毅夫、王燕, 2016: 《超越援助》, 北京大学出版社。
77. 林毅夫、王勇、鞠建东, 2018: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NO.C2019009。
78. 林毅夫、文永恒、顾艳伟, 2021: 《中国发展潜力展望: 2020-2035、2035-2050》,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 No.C2021005。
79.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 2010: 《“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经济研究》第 10 期。
80. 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主编), 2018: 《产业政策: 总结、反思与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81. 林毅夫、张鹏飞, 2005: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第 4 期。
82. 林毅夫、张鹏飞, 2006: 《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83. 林志帆, 2015: 《最优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华南

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论文。

84. 林志帆、龙晓旋, 2015: 《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动态》, 第 12 期。
85. 刘辉, 2018: 《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金融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的革新》,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第 5 期。
86. 刘辉, 2019: 《论金融法的结构理性——基于金融禀赋结构理论视角》,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87. 刘慧龙、吴联生、肖泽忠, 2014: 《国有企业改制与 IPO 融资规模》, 《金融研究》第 3 期。
88. 刘培林、贾坤、张勋, 2015: 《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 《管理世界》第 5 期。
89. 刘培林、贾坤、邹静娴、申广军, 2020: 《“均值回归说”低估了后发追赶国家的增长潜力》, 《国际经济评论》第 1 期。
90. 刘培林、刘孟德, 2020: 《发展的机制: 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 《管理世界》第 5 期。
91. 刘瑞明、石磊, 2015: 《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 理论与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第 4 期。
92. 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菠阳, 2017: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地理科学进展》第 11 期。
93. 刘向兵、伍聪、曾丙健, 2014: 《以自生能力理论审视高校对口支援》, 《中国高教研究》第 4 期。
94. 鲁桐、党印, 2014: 《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分行业比较》, 《经济研究》第 6 期。
95. 毛盛志、张一林, 2020: 《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金融研究》第 12 期。
96. 欧阳志刚、陈普, 2020: 《要素禀赋、地方工业行业发展与行业选择》, 《经济研究》第 1 期。
97. 申广军, 2016: 《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管理世界》第 12 期。
98. 田国强, 2021: 《中国经济学思维方式与关键研究方法》, 《探索与争鸣》第 8 期。
99. 王坤宇, 2017: 《国家发展战略与能源效率》, 《经济评论》第 5 期。
100. 王丽莉、文一, 2017: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 《经济评论》第 3 期。
101. 王勇、华秀萍, 2017: 《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 《经济评论》第 3 期。
102. 文一, 2016: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3. 文一, 2018a: 《中国崛起的秘诀与挑战——“新制度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报》第 3 期。
104. 文一, 2018b: 《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政治经济学季刊》第 2 期。
105. 吴清扬、姜磊, 2021: 《工业企业自生能力与存活时间: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经济评论》第 4 期。
106. 谢贤君、王晓芳、孙博文, 2019: 《金融结构影响消费者福利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兼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经济评论》第 6 期。
107. 徐朝阳、林毅夫, 2010: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108. 徐朝阳、林毅夫, 2011: 《发展战略、休克疗法与经济转型》, 《管理世界》第1期。
109. 徐丽鹤、吴万吉、孙楚仁, 2020: 《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中国还是美国》, 《世界经济》第11期。
110. 徐忠, 2018: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经济研究》第7期。
111. 许成钢, 2020: 《经济学理论的贫困——从博尔顿“货币主义之困”得到的启发》, 《经济学(季刊)》第5期。
112. 许岩、尹希果, 2017: 《技术选择:“因势利导”还是“适度赶超”?》,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3期。
113. 杨蕙馨、王海兵, 2015: 《中国教育收益率:1989-2011》, 《南方经济》第6期。
114. 杨文欢, 2019: 《因势利导与自生能力:可持续基层治理创新的分析框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15. 杨子荣、张鹏杨, 2018: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 《经济学(季刊)》第2期。
116. 姚耀军、李明珠, 2013: 《金融结构、中小企业与反贫困——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经验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第9期。
117. 尹雷, 2016: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与实证研究》,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18. 战明华、李帅、姚耀军、吴周恒, 2021: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金融研究》第3期。
119. 张成思、姜筱欣、袁江, 2013: 《资本轮动、行业潮涌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 《世界经济》第2期。
120. 张鹏飞, 2011: 《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制度结构》, 《世界经济》第11期。
121. 张天华、董志强、付才辉, 2017: 《大城市劳动者工资为何更高?——基于不同规模城市劳动者收入分布差异的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122. 张一林、龚强、荣昭, 2016: 《技术创新、股权融资与金融结构转型》, 《管理世界》第11期。
123. 张一林、林毅夫、龚强, 2019: 《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管理世界》第3期。
124. 张一林、林毅夫、朱永华, 2021: 《金融扭曲、经济转型与渐进式金融改革》, 《经济研究》, 2021年11期。
125. 张一林、蒲明, 2018: 《债务展期与结构性去杠杆》, 《经济研究》第7期。
126. 赵秋运、王勇, 2018: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财经研究》第9期。
127. 郑洁、付才辉, 2020: 《企业自生能力与环境污染: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经济评论》第1期。
128. 智琨、傅虹桥, 2017: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证据》, 《经济评论》第4期。
129. 周端明, 2021: 《我与新结构经济学二十多年的教学故事》, 载于林毅夫和付才辉主编《新结构经济学教研参考》(会议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61-162页。
130. Åberg, J.H.S., and Becker, D., 2020, “China as Exemplar: Justin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nd the Unorthodox Orthodoxy of the China Model”, *Politics Policy*, 48, 815-835
131. Acemoglu D., M. Golosov, and A. Tsyvinski, 2008, “Markets versus Government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1), 159-189.
132. Aguiar M, and G. Gopinath, 2007, “Emerging Market Business Cycles: The Cycle Is the Tre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1), 69-102.

133. Allen, T., and C. Arkolakis, 2014, “Trade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spati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9(3), 1085-1139.
134. Ang, J. B., 2019, "Agricultural legacy and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 397-425.
135. Brautigam, D., T. Weis, and X.,Tang, 2018, “Latent advantage, complex challenges: Industrial policy and Chinese linkages in Ethiopia's leather sector”,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 158-169.
136. Bruno,R. L., E. Douarin, J. Korosteleva and S. Radosevic, 2015, “Technology choices and growth: testing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18(2), 131-152.
137. Chen, B., J. Y., Lin, 2021,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9 , 612 – 634.
138. Chen, Y., Z., Fan, X., Gu, and L., Zhou, 2020,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11), 3393-3430.
139. Coase, R., 1998,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2), 72-74.
140.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2008,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41. Debreu, G., 1959, *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42. Demirgu, A., K. E., Feyen, and R. Levine, 2013, “The Evolving Importance of Bank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7(3), 476-490.
143. Docquier F., and H., Rapoport, 2012, “Globalization, Brain Drai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3), 681–730.
144. Feng J., and M., Li, 2019,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hina Economist*,14(06), 36-55.
145. Frédéric D., and H., Rapoport,2012, “Globalization, Brain Drai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3), 681–730.
146. Gong, Q., J. Y., Lin, and Y., Zhang, 2019, “Financ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Manchester School*, 87(2), 183-204.
147. Grossman G. M., and A. B., Krueger, 1995,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2), 353-377.
148. 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9, “Optimal Development Policies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Econometrica*, 87(1),139-173.
149. Jian J.,, H., Li, M., Leah, and C., Zhao, 2020, “Do policy burdens induce excessive managerial perks? Evidence from China’s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Economic Modelling*, 90, 54-65.
150. Jin K., 2012,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5), 2111-2146.
151. Jones B.F, and B. A., Olken, 2008,“The Anatomy of Start-Stop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3), 582-587.
152. Ju, J., J. Y. Lin, Q., Liu and K., Shi, 2020,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07, 102192.
153. Ju, J., J. Y., Lin and Y., Wang, 2015,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6, 244-263.
154. Kahneman, D., 2003,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 (2), 162-168.
155. Kornai, J., E. Maskin, and G., Roland,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 (4), 1095-1136.
156. Landreth, H., and D. C., Colander, 2002,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4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157. Liao G., X., Chen, X, Jing, and J., Sun, 2009, “Policy burdens, firm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turnover”,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 15-28.
158. Lin J. Y., 1989.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Cato Journal*, 9, 1-33.
159. Lin J. Y., 1991, “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7, 1-15.
160. Lin J. Y., 2003,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2), 277-308.
161. Lin J. Y., 2009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2. Lin J. Y., 2009b, “Beyond Keynesianism: The Necessity of a Globally Coordinated Solu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1(2), 14-17.
163. Lin J. Y.,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2), 193–221.
164. Lin J. Y., 2012a,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5. Lin J. Y., 2012b,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66. Lin J. Y., 2012c,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7. Lin, J. Y., 2013,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and global recovery”,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5(3), 400-411.
168. Lin J. Y., 2014, “Industrial policy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 *China Economic Journal*, 7(3), 382-396.
169. Lin J. Y., 2015a,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8(2), 96-113.
170. Lin J. Y., 2015b, “Why I do not Support Complete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China Economic Journal*, 8(1), 86-93.
171. Lin J.Y., 2016, “The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In book (Editor: Martin Andersson and Tobias Axelsson): *Diverse Development Path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scape from Poverty* (pp.43-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2. Lin, J. Y., 2017,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5(1), 5-18.
173. Lin J. Y., 2021,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8, 106-111.
174. Lin J. Y., and A., Z. Nowak, 2017,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or Less Advanced Countries*. Warsaw, Poland: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175. Lin J. Y., and A., Z. Nowak, 2018, *New Structural Policy in An Open Market Economy*. Warsaw, Poland: University of Warsaw Faculty of Management Press.
176. Lin J. Y., and C., Monga, 2011,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9(3), 264-290.
177. Lin J. Y., and D., Doemerland, 2012, “Beyond Keynesianism: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Times of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conomics and Policy*, 3(3), 1-29.
178. Lin J.Y., and G.,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2), 426-431
179. Lin J. Y., and G., Gong, 2008, “Deflationary Expansion: An Overshooting Perspective to the Recent Business Cycl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 1-17.
180. Lin J. Y., and H., Xing, 2020, "Endogenou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pers 2011.03695, arXiv.org, revised Feb 2021*.
181. Lin J. Y., and J., Nugent, 199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 N. Srinivasan and J. Behrm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3, North Holland: 2301-2370.
182. Lin, J. Y., and P., Liu, 2006,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penness And Rural Poverty: A Framework And China’s Experiences”, *Research Paper2006/043, Helsinki: UNU-WIDER*.
183. Lin J. Y., and X., Wang, 2017, "The Facilitating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Man and the Economy*, 4(2), 1-19,
184. Lin J.Y., and X., Wang, 2019,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o.E2019003.
185. Lin J. Y., and Z., Li, 2008, “Policy burden, privatiz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6(1), 90-102.
186. Lin J. Y., F., Cai and Z., Li, 1998,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8 (2), 422-27.
187. Lin J. Y., W., Wang and V. Z., Xu, 2021, “Catch-Up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World Economy*,. 44(3), 602-632.
188. Lin J. Y., X., Sun, and H., X. Wu, 2015, “Banking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58), 131–143.
189. Lin, J.Y., G., Wan, and P., J. Morgan, 2016, “Prospects for a re-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4(4), 842-853.
190. Madsen J., 2019, “Wealth and inequality over eight centuries of British capitalis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8(C), 246-260.
191. Manso, G., 2011, “Motivating Innovation” , *Journal of Finance*, 66(5), 1823-1860.
192. Nunn, N., 2007,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2), 565-600.
193. Olsson O., and C., Paik, 2016, “Long-run cultural divergence: evidence from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2, 197–213.
194. Pritchett, L., 2001, “Where Has All the Education Gon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5(3), 367-391.
195. Rodrik, D., 2010, “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89–93.
196. Siddique, A. B., 2016,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fy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Cross Country Poverty Inc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1(4), 45-78.

197. Starrett, D., 1978, “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7(1), 21-37.
198. Stiglitz J. E., and J. Y., Lin, 2013,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 The Role of Government beyond Ideolog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9. Stiglitz J. E., J. Y., Lin and E., Patel, 2013,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 II: Af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 Stiglitz, J. E., 2002,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3), 460-501.
201. Talhelm, T., X. Zhang, S. Oishi, C. Shimin, D. Duan, X. Lan and S. Kitayama,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Science*, 344 (6184), 603-608.
202. Vandebussche, J., Aghion, P., & Meghir, C., 2006, “Growth, Distance to Frontier and Composition of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2), 97-127.
203. Wang D., A. Muger, and White B, 2019,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Intensity Increase and Energy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Energy Journal*, 40(1), 1-20.
204. Williamson, O. 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 (3), 595-613.
205. Yang, X., 2001,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Wiley-Blackwell.
206. Zheng, S., F., Zhou, and H., Wen,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ross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Viability in China” ,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8, 1-14.